

段 醒 民 著

文 偉 昌 版 社 印 行

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

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

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 129

著 作 者 段 醒 民
發 行 者 范 惠 美
出 版 者 文 津 出 版 社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709—5008

郵政劃撥：0016084—0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出版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定價 精裝 180 元
平裝 140 元

法律顧問
李 兆 欣 律 師

黃序

夫寓言之興，肇自先秦，戰國諸子，各有所見，正如莊生所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者，故各家爭鳴，諸子紛爭。或欲闡明事理，說服羣衆。或欲諷刺社會，改進人生。然事有難言之口，而可喻之於意者，因必講求技巧，使其娓娓動聽，令人樂於接受，寓言因而興焉。漆園倡之於前，韓非繼之於後，其他呂覽、國策紛焉並起，寢假及於後世，附庸而成大國。蓋寓言者，言出於此，而意寄於彼，其辭近、其旨遠。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其爲用亦可謂廣大矣。

唐柳子厚氏，初黨二王以進，其意亦欲盡忠勸於王室。二王既敗，子厚亦被貶，乃自傷懷忠見譏，其身不能安於朝廷之上，悔憤交迫，爲文頗擬屈子之騷，是以集多寓言。觀其黔驢之文可知。驢果安於其爲驢，不出其技，則尙不至於死之理。惟其妄怒而蹄，而終至於斷喉盡肉而止。此柳子以喻人，亦以自傷也。余每讀至此，不禁爲之慨嘆，悲夫！

余友段醒民君，精研柳文，著有「柳子厚家世考述」，近復撰「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條分縷析，頗得風人哀怨之旨，可謂子厚之知音者矣。余讀其書，有感於子厚之忠憤，因忘己之不文，而爲之序。

傳序

段兄醒民精研柳子厚古文有年，故其文章之雄深雅健，情性之純厚篤孝，亦往往似之。嘗先後刊行柳文之論著，有「柳子厚家世考述」等多種。而此書「柳宗元寓言文學探微」，則又一佳構也。

蓋「寓言」之詞，揆諸古籍，首見於莊子；而先秦諸子中亦往往用之，概以之寄意廣喻而已。然則子厚「寓言」之用，實有異於前賢之所論述者；宗元一生，命蹇運否，遇用事者得罪後，即屢遭貶謫，歷經坎坷，對政治之盛衰興亡，社會之疾苦利病，深得於心，可謂明於史，而長於情者也。故子厚之寓言，非僅止於託喻諷諫而已，在欲窺唐代順宗朝「永貞內禪」之隱秘也。史家所謂內禪者，實為逆倫穢行，虛為掩飾。子厚有見於帝王奪權篡位之陰謀真相，然又不敢逕書其事，故不得不藉寓言以發之，以待知者。而今段兄以深諳史學之根抵用治文學作品內涵之深義，故其見解結論，自能深中肯綮，而有過人之處。

又段兄此書，都為六章；分別自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諸途以探究作者之人生體驗，感情內涵及作品之架構等，要之，仍以「永貞內禪」為歸。

段兄此書之著，自立意構思之始，即與余時相切磋，互為研商，故對其用功之勤，資料蒐集之豐，考證之慎密，均知之詳悉。而今即將付梓之時，囑序於余，余預有榮焉，故為之文以志。歲在戊午年臘月。

傅錫壬 謹識

例 言

一、本文是以探發柳子厚寓言文學的隱微指歸爲旨趣，間亦旁涉到文學的技巧與分析；至於校勘、訓詁、考據等問題，則不在論述範圍之內。

二、本文所指的寓言是以王先謙注莊子寓言篇所云：「意在此，而言寄於彼」的定義爲據；然後自子厚全部作品中，選取通篇合於上述標準的加以論述。但其中不包含藉古諷今的史論詩文和一些半寓言的作品。

三、本文引用子厚作品，是以廖瑩中輯注的河東先生集爲底本（省稱廖本）；至於論述時，則博採魏仲舉所輯五百家註音辨柳先生文集（省稱魏本）、蔣之翹所輯柳河東全集（省稱蔣本）、以及孫琮所輯山曉閣評點柳柳州全集（省稱孫本）等版本的詮注斟酌使用。

四、本文第一次採摭前人某篇論著時，必註明其出處；以後如有重出，就不再贅述。至於行款處理：如引文較長或特別重要而須自成段落的，則依正文格式低兩字抄錄；如可節錄而無害原意的，則在行文中用「」表示，以省繁重。

五、本文除敘論是綜合性的說明外，共分六章探發：第一章是就子厚創作寓言文學以影射時事人物的背景略加析論；第二章至第五章，則是歸納子厚寓言作品的內涵性質分章，並依照廖本卷次，將每篇寓言獨立爲一節以探討他的隱微指歸；其間有相互關聯的，採用互見之法，以省篇幅。至於

這四章論述的體例，則依子厚創作旨趣，大別爲韻文寓言和散文寓言兩類闡發。第六章則是全文的結論。此外，更就子厚寓言文學的影射指歸作了一個附表，以收簡明之效。

六、本文論述史實或演繹子厚寓言內涵時，爲免混淆和繁重之累，因而對子厚當代在位的帝王亦逕以廟號（如順宗、憲宗等）名之。至於子厚所曾參加的政治革新團體，亦據今世政黨的定義，直稱爲「黨」，請勿以異端視之。

七、本文撰作體例、行款，以及許多細節未曾在上列各條說明的，都是遵循一般論文通例處理，爲省龐雜，不再一一贅辭。

八、本文是筆者多年浸淫研究柳子厚其人其文以及許多有關資料的一得之見；如有疏謬處，敬請高明指教勘正，以匡不逮。

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

目錄

黃序

傳序

例言

敘論

第一章 柳子厚生活中的血淚體驗及其寓言創作

第一節 柳子厚早年的政治體驗及其寓言創作動機

第二節 柳子厚謫居永州的生活體驗及其寓言作品

第二章 柳子厚傷痛失志的寓言作品

第一節 行路難之一——夸父逐日難

第二節 行路難之二——羣材成棟難

第三節 行路難之三——熒炭常貴難

第四節 跛烏詞——失勢的獨足烏

第五節 籠鷹詞——背時的籠中鷹

第六節 放鷓鴣詞——可憐的鷓鴣鳥

目 錄

一
一
一
一
九
一〇
一二
四六
四六
五二
五八
六五
七一
七七

第七節	瓶賦——利澤廣大的瓶	八二
第八節	牛賦——利滿天下的牛	九〇
第三章	柳子厚寄其憤慨的寓言作品	一〇三
第一節	罵尸蟲文——嫉憤譏佞妬能的尸蟲	一〇三
第二節	斬曲几文——斬除紊亂人極的曲几	一一二
第三節	宥蝮蛇文——遠避陰妬潛狙的蝮蛇	一一八
第四節	憎王孫文——憎恨毀成敗實的王孫	一二六
第四章	柳子厚暴露現實的寓言作品	一三七
第一節	鶻說——殘暴者的定義	一三七
第二節	捕蛇者說——捕蛇者的心聲	一四六
第三節	謫龍說——淪落者的抗議	一五二
第四節	羅說——狩獵者的下場	一五八
第五節	蝮蛇傳——嗜取者的悲劇	一六四
第六節	臨江之麋——依勢者戒	一七〇
第七節	黔之驢——逞強者戒	一七七
第八節	永某氏之鼠——竊時者戒	一八三
第五章	柳子厚揭發理道的寓言作品	一九三

第一節 宋清傳——求利者的楷模·····	一九四
第二節 種樹郭橐駝傳——理民者的借鏡·····	二〇〇
第三節 梓人傳——相國者的典範·····	二〇七
第六章 結論·····	二一八
附表： 柳子厚寓言文學影射指歸簡表·····	二三四
附錄一：「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讀後·····	二三五
附錄二：重要參考書目·····	二四一
再版後記·····	二五二

敘論

柳子厚，這位中唐政治上的「一世窮人」①，卻能以其弘深論著「氣吞時輩」②而至光耀後世。若專從文學的成就而論，他不但已達駢、散、詩、賦、無體不精的造詣；而且更具卓然自樹，萬古不廢的水準。但是、在他「牢籠百態」③的作品之中，真正能代表其心聲、反映其時代的，卻是一類韻散兼備，短小警策的寓言文學！

寓言是一種特殊地表情達意的語言方式；它雖不受一般學者的重視，但早在詩經時代，寓言作品即已出現④，此後亦經常被文士政客用作說理、譬喻，甚至影射抒憤的工具⑤。大致而論，人們使用寓言的原因可能是：（一）不願直言。（爲避免與人爭論，或不使場面尷尬。）（二）不能直言。（這是因爲事理玄奇抽象，或無法取信於人。）（三）不敢直言。（這是恐懼觸犯時諱法網，或遭遇不測。）先秦諸子、尤其是莊子的寓言，多屬前二者；而屈原、司馬遷的作品，則近於後者。至於子厚、除了文學技巧的運用外，又爲何要迂迴隱祕的撰作寓言呢？簡而言之，他和屈原、司馬遷一樣——不敢直言；但若仔細而認真的檢討，則又非三言兩語可盡了。

另一方面，宋代以後的學者，雖不能否定晏殊所云：「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瀾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矣」的定論；但自歐陽修宗桃韓愈，倡行古文以來；子厚「蹈道不謹，昵比小人」⑥的人格與出處；直到清季桐城派專擅文場的近千年間，抨擊撻伐之論，不絕

如縷。其間雖有卓識之士爲子厚辯冤白謗^⑦，但亦無法爲他翻案成功；難道子厚果真是「不自貴重願藉」^⑧而在人格上確有足資垢病之處？如據傳統正史——韓愈《順宗實錄》（以下省稱實錄）、舊唐書、新唐書以至資治通鑑（以下省稱通鑑）——所載，則可答曰：「是！」不過，如若博採其它有關資料，卻又不易遽然作答了。

綜括上述子厚爲何創作寓言？子厚人格究竟有無瑕疵？這兩個看似毫無關涉的問題，如能逐一作深入的探索，則其結果必將歸結在「王叔文黨」爲忠爲姦的認定！

王叔文黨在正統史冊中一直被目爲「貪帝病昏：規權逐私」^⑨的姦邪之輩，後世卑視子厚人品的依據亦在此。不過如就子厚而言，他生長於唐室陵夷、民生凋蔽的時代，秉持著「生人之道」^⑩以求「大中之所宜」^⑪的熱忱與理想，在德宗晚年、和一羣志同道合的時儔、組成了表面上以王叔文爲首、而實際上直接承受太子李誦指導的政治革新政黨。不久，李誦繼立爲帝，他們亦頗執行若干「一明大道，施于人代」^⑫的善政；但卻因此激起了強大的反抗勢力，不出半載，順宗李誦就在宦官導演的政變中，被迫「內禪」給居於敵對地位的太子李純；而叔文等亦因此或死或貶；此後尚須承坦憲宗皇朝所加的罪名與迫害，蒙受身後可能存留在歷史上的誣妄之詞。子厚在這次政爭失敗後，被貶廢於蠻夷瘴癘的永州（今湖南零陵），過著被監視、被迫害的罪囚生活，而他的寓言作品即是在這種背景中產生的。那麼，在子厚隱微的寓言文學中，除了可能自傷不幸外，如果尚及其它，而這「其它」又會是什麼呢？

事實上，子厚寓言作品的背後，幾乎每一篇都交織著他個人、朋友、乃至家國民人的血淚與憤怒

；而他卻以比屈騷更隱祕、比史遷更悲痛的文學形式來抒發情感、影射史事。因此，他必須在這類凝聚血淚事實的作品表面，披上精湛動人、幽默有趣的文學外衣，冀求流遠傳廣、引人深思，達成他留存史實，洗刷誣謗的初衷。然則，子厚寓言作品精微指歸的重要，不但關係於他個人的品德與志業、順宗君臣的名節與作爲、尤其更牽涉到民生疾苦、社會阨陝、乃至於唐室覆亡的根本原因！爲此，子厚在寓言作品之外，更藉山水遊記、史論著述、乃至於某些墓銘祭文、書啓贈序一再透露寓言的消息，以烘托他刻意創作文學、求名後世的真正目的：全在於寓言作品之能受人重視、進而抉發其內在的深意。

可是，正因子厚過於重視寓言作品的存在意義，他幾乎是以畢生的學養與工力創作這類有血有淚的文學！因此，子厚寓言文學、在表面上即能切合事理的普遍性與物類的特殊性，極具誇張、諷刺的效果，加以文筆精醇、意境雋永，致使讀者一經接觸，就感到神醉目眩、激賞不已；反而忽略了他當時血淚迸流，撰作寓言的真正目的。似此，子厚的寓言文學，雖能在身後千餘年間，愈傳愈廣，可惜讀者祇一味在那裡逐末捨本，取華棄實。這又豈是子厚的初衷？

再說子厚所刻意創作，以烘托其寓言作品指歸的山水遊記等類文學，雖得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⑬，「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⑭之類的讚譽。但是，能像茅坤自其山水遊記之中、體會出他是「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⑮的卓識，已不多見；更遑論能夠抉發子厚刻意寫作文學、以求傳世的真正目的了。那麼、子厚寓言作品之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又何足爲怪呢？

民國以來，子厚淹沒已久的寓言作品，逐漸爲學者所重視；但嚴格而論，那亦祇是將他的散文寓言獨立舉出，侷限於以文論文的窠臼；因此仍難發現子厚撰作的旨趣；直到近三十年來，研治柳集的

學者，方由單純的文學欣賞，推展至探索子厚寓言撰作的幽微指歸。如黃雲眉即嘗云：

他（子厚）在作品上，……盡可能使自己的憤怒悲哀、抑鬱披上了閑適的外衣；而他的暴露現實，尤其是政敵們的罪惡現實，則盡可能採取寓言形式，以避免增加政敵們的仇恨，或者增加他們「下石」資料。（柳宗元文學的評價）

稍後、日本學者清水茂更據黃氏「閑適的外衣」的見解，探發子厚山水文學，並撰成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論文一篇。清水茂說：

永州的流放生活，在京都人柳宗元是不堪忍受的，並且流放的原因又是由於政治勢力間的鬥爭，所以他毫無一點在道德上犯罪的感覺。他不可能以公開的形式來表示他的抗議，但又不能自己，所以就不得不借別的事物來發泄他的憤慨。如「祭呂衡州溫文」則把他的憤慨寄托在他人身上，而在「憎王孫文」中，則寄其憤慨于非人類的猿類身上，同時就像本文所論述的，也把他的憤慨寄托在山水之中。雖然，他寄托的方式以及文體有種種不同，但柳宗元的文學和他的生活體驗有密切的聯繫，不論那一種形式都充分表現了他的個性，這一點是相同的。

子厚寓言作品的真實內涵，乃至子厚全部文學作品的精神，經過上引兩節論述文字的闡發，才有了較為正確的指歸；不過筆者認為：子厚要以寓言來暴露現實，應不僅止於表現「自己的憤怒、悲哀、抑鬱」而已！他最大的動機與目的則是反映時代的醜惡面貌，期望在歪曲誣妄的虛假記載以外，留下真實的歷史証言；至於子厚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個性」，固然是「和他的生活體驗有密切的聯繫」；但似乎尚須進一步理解：這「個性」並非子厚一人的「憤慨」，而是當代全體理性清明者、忠而被謫

者、以至千萬無辜無告者的憤慨！

不過，設使子厚的寓言僅限於「暴露現實」或「寄其憤慨」的話，充其量亦不過是發洩「私」憤，破壞已存在於現實政治中的事實而已！這雖然有其必要，但應祇是手段，是達到「一明大道」的必經過程而已；如果子厚的寓言僅停滯在「破壞」這一層次，則亦無任何偉大意境之可言了。筆者以為，上述黃氏與清水茂論見中、其最大的缺憾即在於未能發現子厚的山水文學，乃至寓言作品的終極目的；所以就不免誤置子厚於文人好議論的較低層面了。

基於以上析論，子厚的寓言，不但在他所有文學作品中居於絕對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同時亦確實反映了當代黑暗暴虐的血淚真相；並且又能更進一步地揭發他「生人之道」的政治藍圖；像這種莊嚴而偉大、周密而完整的作品，我們自有重新予以評估的必要！

子厚貶廢以後，始終是在一種恐懼惴惴的心理狀態下生活，但爲了保持歷史的真相、爲了避免政敵的仇恨，他非但採擷了詞旨隱秘的寓言方式；而且更將所欲揭發的真人真事，以高度文學技巧融入了「政敵們偵察視線所不及的對象中」^{①⑥}。因此，我們對於子厚寓言作品所曾假借的「對象」——小動物、小人物以至日用器物等，都不能等閒視之了。事實上，亦唯有通過子厚寓言所依附的假借對象，始可能理解他當年真正的心影。不過，子厚當年所用的對象，既能使「政敵們偵察視線所不及」；則後人又如何能夠會意？即使有所會意，試問：又將憑藉什麼去探測抉發子厚所影射的人事呢？千百年來，無人得以勘破子厚寓言的指歸，而祇能作空泛寓意的揭露，原亦是無可厚非的事了。

晚近行世的「柳文指要」一書，雖和古人一樣，並未重視子厚寓言作品的重要價值；但該書作者

由於專治柳文，號稱博通，實具相當深入的工力，因而常不自覺地指出子厚某篇寓言是影射某類人、甚或某人。這對研治子厚寓言者而言，無異是一個重大而有價值的發現。可惜他這一發明祇是出於情不自禁，並未逐篇擅攔、整體歸納，爲後學者拓一坦途。況且就在他所發明影射的三數篇中，亦幾乎都是訴之情感的直覺判斷，能提出服人証據的絕少。像這樣自說自話，雖具新義，但卻不是治學者應有的態度。然則，我們如欲真正了解子厚的寓言作品，勢必要從頭開始，細心探索了。

子厚的寓言作品，既是血淚交織而成的；換言之，那必須先有血淚事實的發生，而後始可能產生出寓言作品。明白了這一常識性的因果關係，那麼子厚絕大多數寓言作品之有特定人事影射，亦不煩詳喻了。事實亦唯有如此，子厚所肩荷的血影淚痕，方能有所寄托、有所歸宿，而不致失之空泛，流於漫罵了。另一方面，我們亦可從子厚寓言作品本身，窺出端倪。譬如，他那篇最生動、最有名的「黔之驢」^①，單在這題目上，我們就可發現：驢是一種常見家畜，處處都有；但子厚爲何卻偏偏選用這個荒僻、而又與他生活經驗無關的「黔驢」呢？子厚能夠根據道聽途說就像原文中那樣繪影繪形的深刻描摹嗎？如果我們對子厚創作文學的審慎態度、及子厚生活中的血淚體驗有所認知的話，那麼，這「黔驢」就彷彿是在強烈地暗示、指引讀者，他是言之有其人，指之有其事的；冀望讀者能夠深入其寓言所假借的「黔驢」、作更進一步的探究，以便達到他留存史實與「言之者無罪」的本旨。然則，通過子厚寓言作品本身所假借的對象，以抉發其影射人事，而明其指歸，乃是必要而唯一的方法了。

當然，筆者在子厚千三百年後的今日，意圖由他的寓言作品中，探索他當時心中所影射的真相，實無異於癡人說夢！不過，我們如能擺脫以文論文的作法，仔細揣摩體味子厚寓言文學的每一字句；

同時再參考有關的資料，相互比勘、印證，未始不能有一新的面貌出現！因此，筆者在七年前即著手逐篇析究；稍後又得見「柳文指要」，雖然作者某些立論甚為偏頗，但在子厚寓言有所影射的這一事實上，卻具有「肯定」的意義；至少這可証明筆者為挾發子厚寓言指歸，而努力擲據他所影射的人或事的研究方向，雖未能臻於至善，但亦幸未誤入歧途。於是就更趨積極、依循上述方向，孳孳勤考，數年來幾經增刪修改，方始撰成本文；並且抱著野人獻曝的心情，付印成冊，期望能有助於世人對子厚寓言、子厚人格、乃至子厚一切文學的真切認識。不過，筆者限於才學，謬誤、辭不達意之處必多；但若因此而蒙 博雅方家的教誨指正，則所企望者。

附 註

- ①語見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一。
- ②語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 ③語見廖登中輯注河東先生集（以下簡稱「廖本」）卷二十四、愚溪詩序。
- ④參見詩經卷八、團風鴟鵂篇；朱熹詩集傳卷八、「團」鴟鵂各章集注。
- ⑤參見李奕定中國歷代寓言選輯。
- ⑥同②註。
- ⑦參見宋嚴有翼柳文序、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明王世貞書王叔文傳後；清王夫之讀通鑑論、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文。